

统一战线视阈下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相持阶段的重要作用

李 玟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总方针,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各项策略主要围绕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广泛合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以国共关系发展为导向,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重点,以“区别对待”与“利用矛盾”为策略,统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各项工作。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寻求广泛的合作与支持,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应对反共高潮、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中共中央南方局; 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 反共高潮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2-0096-07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outher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Stalemate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Front

LI Di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policy was the basic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On this basi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of the CPC revolved arou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striving for extensive cooperation. As a secret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in Chongqing, the Souther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uid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uomintang of China (KMT) and the CPC,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carried out work in the KMT ruled areas and Japanese-occupied areas based on the strategie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ntradictions”. To improv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CPC, the Southern Bureau sought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e CPC’s insisting 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dealing with the anti-communist upsurge, and maintain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Key words: Souther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United Front; cooperation be-

收稿日期: 2020-10-11

作者简介: 李 玟(1992-),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ti-communist upsurge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中心。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宣传、统战、组织动员等多方工作。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南方局在重庆的各项工作均以隐蔽方式开展。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在发展统一战线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南方局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政策也随之调整:一方面尽量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p763)}的政策。

学界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既往研究,已关注到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具体工作、南方局对社会各界的组织与动员、南方局领导人的相关思想主张等方面,但从统一战线视阈下对南方局开展各项工作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对此,本文通过梳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践,并结合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探讨南方局开展宣传、统战等工作的理论依据及其重要作用。

一、以国共关系为导向 突破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格局。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左右两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整体走向。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宣传、统战、组织动员等方面的政策大多围绕国共关系的发展而制定和调整。抗战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政策,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以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为导向统筹各项工作。

(一) 公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绩与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情况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由此进入了异常艰难的局面:为限制中共敌后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防御工事和严密的封锁线,对边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进行全面封锁。

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以“内容反动,诋毁中央,诬蔑政府”^[2]为由,要求各级政府、党部对中共创办的《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岳日报》《华北总攻击战之捷报》《救国日报》等宣传刊物进行检扣查禁。此外,国民政府专门下设中央图书杂志密查委员会,定期公布“查禁书刊一览表暨停止发行图书一览表”^[3],对图书的出版发行实行严格管控。为了遏制宣传、阻断通讯,国民政府颁布通令,对往来敌后根据地的邮件进行严格查验:“以延安情形特殊,请转饬将直封延安邮件概交西安邮件检查所检查。”^[4]对敌后根据地广播通讯内容实行严密监听:“延安电台逐日有广播,且每日多广播《解放日报》之社论……指定专责机关或人员,逐日收听具体报,仿照国宣局之敌方广播记录办法办理。”^[5]

为了阻止国内外记者亲历抗日根据地了解实际情况,阻碍相关消息和真实报道的公开,国民党政府除了查禁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书报刊物以外,还对根据地实行交通封锁,尤其对外国记者、旅华作家等具有较强传播影响力的群体实行严格限制:“普通外人在国内游历须由外交部核发护照,外籍记者赴国内各地采访新闻,向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代向军事委员会请领执照,始得成行。乃近一年来,陕北竟有未领执照之外国记者,显系地方军警检验欠周所致。嗣后各地军警对于外人通过时所持执照务必切实检验,以免疏漏。”^[6]针对大量青年学生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敌后抗战的现象,国民党政府发布《关于严加限制在学青年赴西北给重庆市私立求精中学的训令》^[7]《关于不得任意发放旅赴西北护照的训令》^[8]等训令加以阻止。

在国民党政府封锁邮电、检扣书报、限制人员往来的强制政策之下,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形难以透露到外界,国内外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以及根据地建设情况知之甚少。对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针对国民党宣传的中共军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9]的言论,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发布八路军和新四军战报,先后发表了《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10]《粉碎敌人进攻经过与经验教训》^[11]《鲁豫皖我一月游击战果——毙敌一万二千余,获枪三千余支,子弹十万余发》^[12]《八路军两月血战,华北我歼寇万余,大小共250战,生擒敌伪千六百人》^[13]《集小胜为大胜,二月份下半月我毙敌两万余,山西歼敌一万三千》^[14]《模范的歼灭战——进攻陈庄的敌人是怎样被歼灭的》^[15]等文章,公布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敌后根据地建设情况,宣传边区军民的抗战成果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立场与决心,用事实打破“中共不抗日”的谣言。

(二) 采用稳重、灵活的策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防共限共”的事实

“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16](p479)党报党刊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同社会大众联系的公开舆论阵地。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其宣传发行工作。为了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抗战成果,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积极发表进步言论,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及主张;公布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绩以及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情况;刊登与外国政要及国际友人的访谈及其对国共合作抗战的态度;揭露国民党内部“防共限共”的政策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

由于频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实,多次刊登国民党内部关于“严密防范中共活动”的指令电文,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打压,一度被国民政府新闻总署“查禁在案”^[17],并要求“各地邮电检查所认真检扣……以杜流传”^[18]。自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部门禁止刊发稿件260余篇,被强令删节150余次。全国各地《新华日报》营业机构屡屡被强令查封,报刊被检扣禁止发行,报童遭到殴打甚至拘捕。面对报社随时可能被迫停止出版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调整工作方式“一要稳,就是‘不失立场,有时不便说就不说,够分量就行了’。二要活,就是‘不呆板,要巧妙’。”^[19](p561-562)《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随即改变宣传策略,精简报社机构,缩减报纸版面,社论的发表也更加灵活机动。在避免产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以稳重而灵活的策略继续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坚持做好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宣传工作。

(三) 开拓海外宣传新阵地,打造对外宣传新平台

在向国内社会宣传发声的同时,南方局着力拓展国际方面的宣传,力图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为了保护南方局的实力和影响,防备国民党政府对南方局工作人员进行查处,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安排部分南方局工作人员和四川省地下党员转移至香港或海外,开辟新的宣传阵地。

1938年1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随后在香港出版了《新华日报社论集》,创办了《华侨通讯》,面向广大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成果,通过刊登前线战报、报道前线战况,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这些刊物在香港、菲律宾等地均保持一定的发行量,所刊载的文章也经常被海外华侨所办的报刊转载引用,读者受众面相当广泛。1942年,南方局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开始编辑出版英文宣传册,其内容大多是中共领导人针对时局发表的文章或讲话、抗日根

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情况、国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所撰写的文章或接受的访谈,这些宣传册出版后,由南方局工作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向各国驻华使馆和外国媒体散发,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海外宣传新方式和新阵地的开拓,突破了中国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打开了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的新局面。

二、以统一战线为重点 团结一切力量 争取广泛支持

团结一切力量、争取广泛支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设立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地处中间党派、民主团体、各国驻华机构和国际友人云集的中心,团结国内外各方力量,争取广泛合作成为南方局工作的重点。

(一) 团结中间势力与海外华侨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海内外全体同胞的一致追求。在对日作战的立场上,许多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都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同的主张:团结一致,坚决抗战。与此同时,作为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他们对国民党有着实行民主制度、反对一党独裁的政治诉求。在开展对中间党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时,南方局一方面向他们表明中共坚决抗战的政治立场以及在敌后战场的抗战成果,宣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和敌后抗战的事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以坚决维护政治民主的共同立场,反对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政策,在追求民主政治方面与支持抗战的党派团体和进步人士达成了共识,建立了友好关系。

南方局通过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先后争取到许多国际援华救济团体和个人的捐助,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争取到了钱款以及医药、器材等物资。1940年1月,沈钧儒受邀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唯一路径。”^[20]表达了坚持团结,反对内战和独裁的态度。1940年3月,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等人组成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自仰光飞抵重庆。在重庆,陈嘉庚与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就有关国共两党摩擦问题进行了交谈。5月底,陈嘉庚率领慰劳团一行赴延安,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情况,并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国共关系及谈判调解的进展进行交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董必武等南方局成员积极争取中间党派,向其揭露皖南事变的经过和一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情况,得知真相的党派团体乃至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参政会,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人上书蒋介石^{[21] (p362)},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和国民政府^{[21] (p364)},一致表示当前抗战局势尚未稳定,在国难面前一切党派纷争都必须搁置,各党派团体和抗日力量都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抗战到底。此后,当中共代表以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方式公开抗议国民党的反共行动时,再次得到了中间党派代表议员的支持。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声援,不但给中共公开声讨国民政府以有力支持,而且在社会各界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使得国民党的“溶共限共”政策不得不暂时搁置,反共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二) 开展国际统战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22] (p752)}的精神,并且基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的严峻形势,在国际社会上做好对美国、英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统战工作也成为这一时期南方局工作至关重要的部分。

美国、英国和苏联都寄希望于中国坚持抗战,牵制日本,反对此时的中国因党派斗争引发内战,导致抗日战争失败。因此,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战争的倾向,作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国,英美苏等

国首先会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其坚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除了争取主张抗日的党派团体和进步人士以外,南方局工作人员还经常与到访或常驻重庆的外国政要交往会晤,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驻华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共军事摩擦频发时向他们陈诉国民党防共限共的事实,以寻求同盟国的支持。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站在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立场,得到了英美苏等同盟国的有力支援,虽然陷入了相持阶段,但是中国抗战的前景总体向好。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战争意味着破坏抗战力量,因此,南方局指示党报党刊登载中共领导人、外国政要、海外华侨呼吁团结一致抗战的谈话和文章,强调只有团结抗战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通过舆论号召对国民政府施以压力。

三、以“利用矛盾”为策略,牵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动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重新审视当前的国际国内局势,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应当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并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国际援助,以应对日军的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

(一)“区别对待”与“利用矛盾”的策略

1940年,随着美国、英国、苏联为牵制日本相继加强对华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同年10月,日军为遏制中共军队的迅速发展,在华北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使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空前困境,国民党顽固派则借此机会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高涨的反共气焰,毛泽东指示党内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寻求国际支持,以牵制国民党政府的反共行动。虽然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但是这一时期应当重新审视当前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随着战争局势和国际形势变化,对不同性质、不同立场乃至不同对华策略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进行区别,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毫不动摇;对于同日本结成法西斯同盟的德国、意大利与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美国、英国要进行区别;对于美国、英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也要有所区别,此前美英等国对中国的抗战实行“远东慕尼黑”政策,纵容日本侵华,而这一时期英美为限制日本南进,转而加强对华援助,成为中国抗战的盟友。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1](p764)},即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地争取外援。德意日三国协定签署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给予了中国抗战大量援助,以支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牵制日本的力量,直至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行动,打击了中共抗战的有生力量,使中国抗战面临着国共合作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最终将导致抗战失败、反法西斯战争受挫的严重后果。因此,英美苏等同盟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允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产生分裂,甚至引发大规模内战。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国内外战争局势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之后,指示南方局利用各种条件广泛寻求反法西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二)“利用矛盾”争取国际援助,应对反共高潮

1940年底,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把国共合作正面临分裂的严峻局势如实告知国内外友好人士,强调这种情况只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有利,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反法西斯国

家十分不利,因此要奔走呼号,动员各方面的舆论来制止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为了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南方局收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国共摩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寄往西安、桂林、香港和海外散发传播。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使国际社会了解真相,洞悉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实,南方局将事件始末编印成《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23],寄送给驻重庆的外国官员和记者,并印制传单远送海外传播。为了争取更有力的支持,周恩来亲自拜访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向他说明皖南事变的原委,陈诉国民党顽固派一直以来的反共政策。卡尔随即向英国政府报告,并向蒋介石转达了英国政府对此事件的态度“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6] (p497)},敦促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保持密切联系,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以后,南方局工作人员就与在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驻华武官崔可夫建立了友好关系,经常就抗日战争、苏联援华、国共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了解皖南事变情况后,潘友新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崔可夫则向蒋介石转达了斯大林的态度“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16] (p503)},要求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美国政府同样对皖南事变给予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盼望国共继续坚持合作。1941年2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在重庆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向居里说明,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政策的后果是引发国共两党战争,进而削弱中国抗战的力量,最终将导致抗战失败、日本南进。对此,居里表示美国“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随后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16] (p503)} 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给国民党政府以沉重打击,也是影响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行动的因素之一。

皖南事变使中共军队遭受惨重损失,南方局配合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应对措施,一方面将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矛盾公之于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事实,另一方面从抗战全局的角度争取国际支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普遍的同情与支持。在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声中和美国、英国、苏联等国的外交压力下,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四、结语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南方局以重庆为依托,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策略付诸卓有成效的实践。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南方局领导的党报党刊突破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边区的新闻封锁,不但使国民党政府“防共限共”策略公之于国内外社会,更将中国共产党远在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和敌后战场的抗战成果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宣传了中共坚决抗战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为中共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为击退反共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政局与战局,南方局响应中共中央“区别对待”、“利用矛盾”的国际统战策略,在坚持独立自主抗战的原则下争取了有力的国际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和南方局的积极应对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抗战主张愈发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四川省政府、会计处关于严防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及查禁书刊杂志的代电、呈文、密令(1941年4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号:民044-01-0007.
- [3]四川省政府、会计处关于严防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及查禁书刊杂志的代电、呈文、密令(1941年8月11日),

- 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号:民044-01-0007.
- [4]关于严密检查所有寄往延安之邮件的密通令(1942年2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3420001001830000054.
- [5]关于请侦听延安电台等致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的函(1941年6月1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040001000590000020.
- [6]兵工署关于规定各地军警必须切实检查外国人所持执照给兵工署驻川南办事处的通令(1940年3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0340001005750000001.
- [7]关于严加限制在学青年赴西北给重庆市私立求精中学的训令(1939年1月),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410001000020000071.
- [8]关于不得任意发放旅赴西北护照的训令(1939年1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 档号:00530023000800000001000.
- [9]四川省政府、会计处关于严防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及查禁书刊杂志的代电、呈文、密令(1940年10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号:民044-01-0007.
- [10]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N].新华日报,1939-01-08(3-4).
- [11]粉碎敌人进攻经过与经验教训[N].新华日报,1939-01-09(4).
- [12]鲁豫皖我一月游击战果——毙敌一万二千余,获枪三千余支,子弹十万余发[N].新华日报,1939-02-08(2).
- [13]八路军两月血战,华北我歼寇万余,大小共二百五十战,生擒敌伪千六百人[N].新华日报,1939-03-02(2).
- [14]集小胜为大胜,二月份下半月我毙敌两万余,山西歼敌一万三千[N].新华日报,1939-03-08(2).
- [15]模范的歼灭战——进攻陈庄的敌人是怎样被歼灭的[N].新华日报,1939-12-13(2).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 [17]四川省政府、会计处关于严防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及查禁书刊杂志的代电、呈文、密令(1941年4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号:民044-01-0007.
- [18]四川省政府、会计处关于严防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及查禁书刊杂志的代电、呈文、密令(194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号:民044-01-0007.
- [19]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0]新华日报,1940-01-11(6).
- [21]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 [22]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A].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3]四川省政府、会计处关于严防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及查禁书刊杂志的代电、呈文、密令(1941年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 档号:民044-01-0007.

(责任编辑:方兴)